

《群书治要》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中的精华

群书治要十讲

刘余莉 / 著

群书治要十讲

刘余莉 /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书治要十讲 / 刘余莉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4. 6
ISBN978-7-5126-2840-3

I. ①群… II. ①刘… III. ①政书—中国—唐代②《
群书治要》—研究 IV. ① D691.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6888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网 址: www.tjpress.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2840-3/D. 419

定 价: 35.00 元

目 录

前 言 /001

上 篇 修身为本，教学为先：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

第一讲 道德教育，治本之道

——从《群书治要》看如何反腐倡廉 /004

一、腐败的根源是道德缺失 /005

二、道德缺失引发三个问题 /010

三、全面加强道德教育的途径 /015

四、仁爱的原点是孝道 /030

五、道德教育的关键在上行下效 /037

六、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040

第二讲 国家兴衰，由于官德

——从《群书治要》看加强官德修养的必要性 /043

一、盛世与民同乐，衰世残害其民 /045

二、盛世考察历史，衰世自骄自智 /050

三、盛世任用忠贤，衰世听信奸佞 /053

四、盛世乐闻其过，衰世乐闻其誉 /061

五、盛世反求诸己，衰世怪罪别人 /064

六、盛世抑损情欲，衰世纵欲享乐 /065

七、盛世天下为公，衰世天下为私 /070

第三讲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

——从《群书治要》看文化的本质 /073

一、经典：文以载道 /075

二、文字：智慧符号 /094

三、礼乐：点滴教化 /104

四、艺术：寓教于美 /109

第四讲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 /114

一、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114

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128

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144

第五讲 孝悌为本，上施下效

——从《群书治要》看传统道德教育的经验 /156

一、教育目标：长善救失 /157

二、教育次序：先做人，后知识 /158

- 三、德育内容：五伦、五常、四维、八德 /173
- 四、因果教育，内容丰富 /179
- 五、德育路径：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 /185
- 六、德育保障：完善的制度和法律 /198
- 七、成败关键：上行下效 /201
- 八、德育心法：反求诸己 /202

下 篇 爱民而安，好士而荣：安危荣辱的两大关键

第六讲 民贵君轻，富而后教

——《群书治要》中的民本思想 /208

- 一、贵民重民 /208
- 二、爱民恤民 /222
- 三、富民利民 /230
- 四、恕民教民 /237

第七讲 任贤使能，纳谏远佞

——《群书治要》中的用人之道 /247

- 一、用人之道，事关重大 /247
- 二、用人原则：任贤远佞 /265

第八讲 八观六验，三参九虑

——《群书治要》中的观人之道 /286

一、观人八法 /287

二、其他观人法 /310

第九讲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群书治要》中的得入之道 /319

一、贤能之士，何世无之 /320

二、得人七方，吸引贤才 /322

第十讲 德不称位，能不称官

——《群书治要》中的用人大忌 /349

一、用贤而疑，人主大患 /350

二、求全责备，失贤之道 /356

三、能不当官，任非其才 /358

四、德不当位，功不当禄 /362

五、偏听偏信，受人蒙蔽 /369

六、妒贤畏能，功灭国危 /370

七、已树而择，所树非贤 /373

八、事繁职乱，禄薄吏贪 /374

附录 古镜今鉴

——《群书治要》的当代价值 /378

一、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人心 /379

二、领导者成败的关键在道德修养 /390

三、领导者道德修养的内容（一）：修身 /395

四、领导者道德修养的内容（二）：爱民 /417

五、领导者道德修养的内容（三）：用人 /426

前 言

《群书治要》是唐贞观初年，魏征及虞世南等臣奉命编辑的治世要典。该书应太宗理政之需，务求古圣先贤之道统与历代君王兴衰之根由，凡经史子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悉皆采摭其中，存简朴之意，去浮诞之说，彰明治体，以道导术，欲令见本知末，简而易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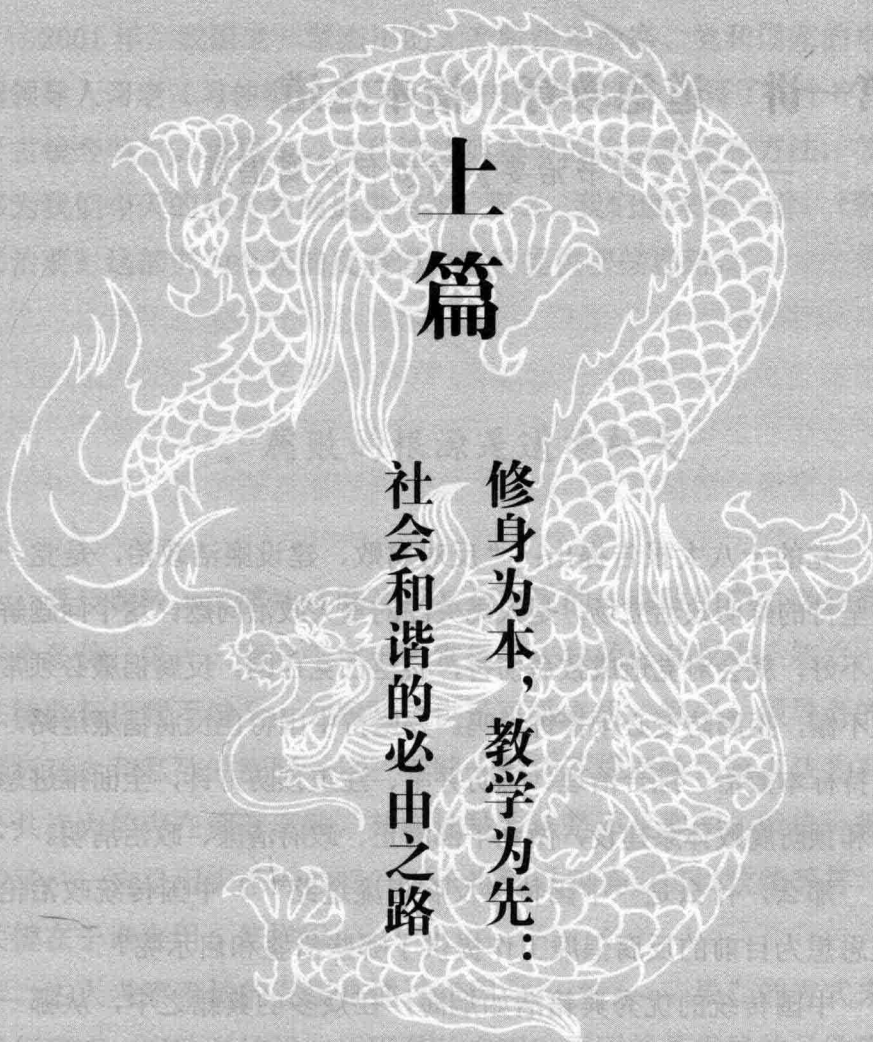
换言之，《群书治要》相当于一部既能救弊于一时，又能成法于万世的施政实用手册。不仅在唐代帮助太宗创下了“贞观之治”，也在后来东渡日本的千余年中，受到了天皇的尊崇，为其成就承和、贞观两代盛世贡献巨大。对欲寻求身心和谐、家国安定、世界太平的有识之士而言，的为一部难得的“次经之书”。鉴于此，2001年2月25日，党和国家老一辈卓越领导人习仲勋同志为《群书治要考译》题词：“古镜今鉴”。

中共中央党校刘余莉教授深知此书对于解决当今社会弊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而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全人类带来永续和平的重要意义，遂在百忙之余，认真研读宝典，涵泳经书章句。《群书治要十讲》，是刘教授对《群书治要》的十篇精要讲解，也是在已出版的《品读群书治要》的基础上，再加丰富完善而成。《群书治要》全书采辑经典六十六种，合五十余万言，虽然纲举目张，善道有统，但读者初阅此书，仍不免畏其浩繁，而有难窥堂奥之憾。刘教授此番讲解，便是以利俗浅文揭橥大纲，学术、人生融贯一体，理事双谈，古今会说，可助读者迅速把握《群书治要》的主旨精髓和当代价值。

刘教授在讲记中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政治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建立在中华传统“圣贤教育”基础上的“圣贤政治”，所有的制度建设和改革都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为好人而设计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以及现今的知识技能传授，而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圣贤文化”，以净化人心、长善救失，培养圣贤君子为核心要务。因此，忽视了圣贤教育的制度改革，不仅无法挽救因为人的良心泯灭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反而还会产生“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弊端；忽视了圣贤教育的文化建设，不仅无从实现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良好愿望，反而还会使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导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后患。

全书立足于当代社会、人心之重大问题，在条分缕析地讲解《群书治要》义理的同时，也引导人们深入反思社会腐败的根源及其对治、加强官德修养之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性、传统文化与圣贤教育的本质蕴涵和学习方法、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实际含义，以及领导者务须注意的用人、观人、得人之道等等。内容丰赡，言辞恳切。观其文，想见其为人，作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淑世救民的真诚心和敏锐的洞识力溢于言表。

文化是民族之灵魂，教育是文化之生机。习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相信《群书治要》这部中华先哲留给后人的治世宝典，定能有助于国人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中国重现盛世之治、为世界实现大同理想提供智慧源泉！



上篇

修身为本，教学为先：

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

第一讲 道德教育，治本之道

——从《群书治要》看如何反腐倡廉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为目前的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哪些借鉴和启示呢？

中国传统的优秀典籍浩如烟海，在众多的典籍之中，从哪一本书可以了解到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经验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群书治要》。《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派遣魏征、褚亮、萧德言、虞世南等大臣从唐朝以前的经、史、子中，将治国平天下的施政精华汇集而成的一部书。这部书是从一万多部的古籍之中精选出六十六部，又从这六十六部之中将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精髓提炼出来，汇集而成。虽然该书只有五十万字，但是读了这部书，可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方法就全都了解了，确实是用功少而收效大。

2001年，我国老一辈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习老（习仲勋同志）为《群书治要考译》题写了四个字：“古镜今鉴”。意思是，古代这些典籍中的治国理念和方法，能够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群书治要》这部书为今天的反腐倡廉能够提供哪些思路。

一、腐败的根源是道德缺失

要反腐败，就要知道腐败是怎么产生的。腐败的产生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一定的公共权力；第二，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为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三，领导者的腐朽观念和私欲的膨胀。这三者缺一都构不成腐败。有人认为有公共权力的存在就有腐败，其实这种看法是不足取的。就像一把刀子，一定是用来杀人的吗？刀子也可以切菜、可以砍柴等等，关键在于谁来用、怎样用。

古人考察事情的发展是通过“因——缘——果”的方式进行研究。腐败是结果，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领导的私欲膨胀和腐朽观念的存在。那么缘呢？缘就是条件。腐败的条件就是法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有因、有缘，才有腐败结果的产生。这是中国古人分析事物产生、发展和结果的方法。

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分析，私欲膨胀和腐朽的观念是

事物产生发展的内因，而法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外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第一位的原因，外因只是它产生的条件。所以，要根除腐败，就要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去除私欲，消除腐朽观念。

很多人认为，西方国家腐败现象似乎没有中国严重，所以只要把西方的某些制度搬过来，腐败现象不就得以解决了吗？

其实，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法制建设的一面，而忽视了其制度产生的文化背景。西方的历史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的传统，它的政治制度维护的是公平正义，而仁慈博爱、诚实守信等道德理念的教育是靠教会来完成的。所以西方社会的治理靠的是两手：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而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制度建设的一面，误以为只要把西方的某些制度搬过来，腐败问题就会得以解决，结果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

什么叫“异体移植”呢？就是这个制度在西方可以适用得很好，但是一挪到中国，它就变得水土不服。比如我们将西方的民主选举运用到我们的村干部选举之中，就出现了大量的贿选拉票、徇私舞弊的现象。当然这一方面和法制的健全有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公民的道德素质不够也是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谁给村民的钱多，村民就去选谁；谁投其所好，他高兴、喜欢谁，他就去投谁的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的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不够，他们参加选举，选出来的人就不是合适的人。

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国出现了“能人现象”。什么是“能人”呢？就是这个单位眼看就要倒闭了，换了一个一把手，结果就扭亏为盈了，就带着这个单位走上和谐发展的道路。人们认为这个人很有能力，把他称为“能人”。其实，当我们反观这一现

象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人不仅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还是一个有德行的人。因为他所采取的制度不是想方设法地损公肥私，把国有资产中饱私囊，他想到的是员工的利益、单位的长远发展，这样的人才可能扭亏为盈。

孔老夫子说了一句话，至今也不会觉得落后，这句话就是“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领导者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他能够奉公守法，不以权谋私，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制度，都不会对企业、单位、国家造成严重的危害。而如果领导者是以权谋私的人，无论是怎样的制度，他都会想方设法地去钻法律的空子。

很多人向西方特别是向美国学习管理，但是我们看一看安然公司破产的案例。安然公司在2000年的时候在“世界五百强”企业排名中是第七位，它的年营业额高达一千亿美元。这样一个实力非常雄厚的企业，为什么说破产就破产了呢？西方国家都是聘请CEO来管理企业，CEO又称“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很有能力，仅仅给工资他是不来服务的，还要让他占有公司的股份。企业经营效益很好的时候，公司的股票就不断地增长，CEO的收益就会不断地提升。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制度：CEO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那么他就会尽心尽力地为企业付出。但是市场有起有伏，不是一帆风顺的，尽管他很努力，有的时候企业营业额也不会总是增长。营业额没有增长的时候，股票就不能增长了，CEO的收益就会受到影响。个人利益受到了影响，怎么办呢？企业没有创收，他就制造收益，于是他就联系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来制造假账。为什么这个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心甘情愿地为他制造假账呢？因为安然公司是以每周一百万美元的代价请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它制造假账。在巨大的诱惑之下，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就答应了。由于制造假账，安然公司的营业额攀升了，股票不断地上涨。

二十九个高管成员都知道这是制造假账的结果，当股票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一起把他们所拥有的一百七十三万股的股票全都抛售出去。因为股票的抛售，他们赚了十一亿美元。这十一亿美元二十九个人分，每个人赚得的当然是很多。但是这个事情很快就暴露了，首席执行官被判入狱，要服有期徒刑一百六十五年。另一位董事会的高级成员用他所赚得的钱买了辆高级的豪华轿车，结果在高级轿车里开枪自杀了。

安然公司的破产被称为美国经济界的“九一一”事件。这并不是因为安然公司制造假账的数额最为巨大，而是在此之后，美国开始对各大跨国公司制造假账的情形进行调查。不调查不要紧，一调查吓了一大跳，各大跨国企业几乎都有制造巨额假账的经历。比如说，世通集团在一年零一个季度里伪造了三十八亿美元的盈余，而另一家著名的国际公司在五年里伪造了六十亿美元的盈余。这些公司制造的假账，在2011年给美国政府造成了两千亿美元的损失。所以为什么金融危机会在美国爆发呢？那不是没有原因的。它的原因就是人的贪欲、人的不诚信。所以它的解决也不是靠一两个制度可以挽回的。

安然公司破产以后，美国的商学院的管理理念就开始有了变化。他们以前所奉行的理念叫做“TQM”，即“全面的质量管理”，认为企业只要把产品的质量关把好，就可以在企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安然公司的破产让他们认识到，企业的高管有一两个人道德败坏，就可以使“世界五百强”的企业毁于一旦。所以他们的理念从“TQM”变成了“TEM”，也就是从“全面的质量管理”变成了“全面的伦理道德的管理”。这一个转变可以说是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

西方著名的美德伦理学家麦因泰尔写了两本书，《追寻美德》

与《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麦因泰尔和罗尔斯齐名，他是以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而闻名的学者。在《追寻美德》一书里，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法律、规则是谁来制定的呢？是人来制定的。那么这个法律、规则在推行的时候，是谁来推行的呢？也是人来推行的。所以他认为，伦理学的任务不是去设计正义的规则和制度，而是要回归到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把培养人的美德作为伦理学的主要任务。他的这两本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同样的观点在几千年前中国古人的著作中就有反映了。《群书治要·孙卿子》（即《荀子》）中就有这样的话：“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荀子认为，法不能够独立存在，有了正人君子、圣贤人，它能够发挥作用，没有圣贤君子，没有正义美德的人，它不可能发挥作用。所以法律、制度是治理的开端和凭依，而圣贤君子是制定法律和推行法律的人。《群书治要·傅子》上用一句话就把制度和人之间的关系说明白了。他说，明智的君主一定会顺着好的制度，才会达到社会和谐、天下大治的结果。但是，“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并不是说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够实行，必须要有好的人来推行这个制度。

上述论述没有否认制度的重要作用，但不认为有了好的制度就能够达到社会和谐。夏、商、周三代的时候，都曾经出现过天下大治的局面。周朝“成康之治”的时候，监狱四十年没有犯人，天下确实达到了大治。虽然这些治国的方法都记载在典籍中，但他们的后代子孙没有按照这些制度去治理天下，这是夏、商、周败亡的重要原因。